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清代卷

陈惠琴 莎日娜 李小龙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國散文通史

郭预衡 郭英德 总主编



清代卷

陈惠琴 莎日娜 李小龙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通史. 清代卷 / 陈惠琴, 莎日娜, 李小龙
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336-7192-1

I. ①中… II. ①陈…②莎…③李…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清代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3890 号

书名: 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

作者: 陈惠琴 莎日娜 李小龙

出版人: 朱智润 策划统筹: 张丹飞 张利 责任编辑: 王平
版式设计: 朱锦 装帧设计: 张鑫坤 技术编辑: 王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6585948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42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192-1 本卷定价: 128.00 元(全套定价: 149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清代论辨文	004
第一节 明清之际论辨文(一)	005
第二节 明清之际论辨文(二)	016
第三节 清前期论辨文	029
第四节 清中后期论辨文	042
第二章 清代书信文	067
第一节 明清之际书信文	068
第二节 清前期书信文	076
第三节 清中后期书信文	082
第三章 清代序跋文	096
第一节 明清之际序跋文	098
第二节 清前期序跋文	105
第三节 清中后期序跋文	116
第四章 清代杂论文	140
第一节 明清之际杂论文	142
第二节 清前期杂论文	146
第三节 清中后期杂论文	154

第五章 清代传状文	160
第一节 明清之际遗民作家传状文	161
第二节 清前期“虞初体”作家传状文	175
第三节 清中后期传状文	188
第六章 清代碑志文	198
第一节 明清之际碑志文	200
第二节 清前期碑志文	208
第三节 清中后期碑志文	214
第七章 清代杂记文	224
第一节 亭台楼阁记	226
第二节 山水游记	230
第三节 书画记	237
第四节 人事杂记	243
第八章 清代札记文	249
第一节 野史旧闻笔记与记史日记	251
第二节 丛考杂辨笔记与学术日记	259
第三节 杂录丛谈笔记与纪行日记	267
第九章 清代辞赋文	279
第一节 明清之际之辞赋文	281
第二节 清前期之辞赋文	287
第三节 清中后期之辞赋文	295
第十章 清代哀祭文	310
第一节 明清之际哀祭文	311

第二节 清前期哀祭文	318
第三节 清中后期哀祭文	327
第十一章 清代赠序文	338
第一节 清前期赠序文	340
第二节 清中后期赠序文	359
主要参考文献	367
后 记	375

绪 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文学创作众体皆备,且多能集前代之大成。就散文创作而言,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皆远超前代。沈粹芬等辑《清文汇》,“编成于清末宣统年间,其所采集已大致包括了全清历代之文。有清初明遗民一百零七家,顺治至嘉庆五朝九百五十一家,道光至光绪四朝二百九十八家,共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万余篇”(《清文汇·出版说明》)。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选的《清文海》,“总计收入整个清代的作者一千五百七十六人,文章约有一万八千三百八十三篇,共分一百零五册”(《清文海·出版前言》),规模宏大,但仍然不能涵盖清文的全貌。

清代散文的发展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相应,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对于清代散文的分期,前人已有较多论述,如王文濡为《国朝文汇》作序时道:

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次则能以纵横胜,修洁胜。乾、嘉之际,汉宋各帜,义理之文,峻于守法,桐城派是也;考据之文,密于征实,毗陵派是也。道、咸之交,明道劬古,外杂以政治思潮异军突起,权舆于龚魏扬厉于汤冯,其气跌宕,其辞嵌崎。延及同、光,或神圣方姚,规行矩步,束修自好,或参覃羽琇,云谲波诡,惊世骇俗,异轳同治,均有可观,猗欤盛矣。(《国朝文汇》序三)

对有清一代的散文创作,王文濡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将清代的散文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并简要评价了各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特点:顺康之世的遗老闻人之文,乾嘉之际的义理考据之文,道咸之交的明道劬古之文,和同光时期神圣方姚或寻求变革的散文创作。

郭预衡先生对清代散文的分期和特点评述更为详尽。他将清文的创作分为六个阶段:一是顺治初年到康熙中期的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其特点是文章不成一统;二是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的所谓“治世之文”,皇权恩威并济,倡导“清真雅正”之文,但文人学者为文立论,在桐城主流之外,亦能别树一帜;三是乾隆、嘉庆之际的文章衰落,这一时期是清代朴学最盛之时,“亦文章之衰世”;四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文章嬗变,文坛无“巨子”,桐城门户已难支持;五是道光、咸丰之际的文风新变,龚、魏诸人,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文章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六是同治、光绪时期的桐城末流和古文文体的解放^①。郭先生的分期比较细致,评述亦颇为精准。

本书论述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体上将清文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明清易代之际,散文创作受时代变革和晚明文风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二是清代前期,康雍之时,社会日益稳定,所谓的治世之文渐成风气;三是清代中后期,乾嘉之时,桐城派兴起,义理考据之文成为主流。由于文学创作是具有个性化的创造,故此,在具体论述中,个别文体的分期与此有所出入,作品时代的划分亦因事而定。

黄人(1866—1913)曰:“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蛻故孳新,瞬息不可复省,而有为之摄影者曰史,而有为之留声者曰文。俾后人若听睹其际,得以识世运消长、人才纯驳之故,非仅恣汎览,供粉饰焉。”(《清文汇》序二)清人的散文创作,虽然不似先秦、唐宋时期大家辈出,佳作纷呈,但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时代特点。对于清代散文的艺术评判,历来观点不一,沈粹芬称“文至国朝而极盛,作者辈出,类能遗貌取神,去疵存粹,有周、秦之神智而不诡僻,有东西京之博雅而不穿凿,有魏晋六朝之新隽而不纤薄,有唐之闳肆而不繁缛,有两宋之纯正而不尘腐”,

^①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46页。

评价甚高。这其中既有《清文汇》编选者对清代散文的偏爱,亦有同代人身在此山、难观真面的历史局限。

清代的散文创作,众体皆备,是古典散文创作集大成的时期,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多。但在“继往”的同时,也造成“开来”的难点。魏禧在《杂说》中写道:

古之文章足以观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观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犁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师友所传,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笃者,日夕揣摩,以取名于时。是以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论。呜呼!虽有孟子之知言,亦孰从而辨之哉!”(《魏叔子日录》卷二)

这是对清初散文创作的评论,但同时,也是有清一代散文创作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清人的散文创作,可资之师太多,“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形式日臻完美,但开启时代风气的散文大家和散文精品却数量有限。

相对于其他时代的散文研究而言,清代散文的研究,目前仍比较薄弱。清代散文的断代研究,多集中于散文通史之中,已有的研究亦多集中于桐城派、阳湖派等。本书的论述从文体的角度分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三大部分,计十一章,希望能梳理清代各体散文的发展脉络。清文浩漫,难窥全豹,对其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是每一个清代散文研究者的良好愿望。但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最大限度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清代各体散文的发展作一个简单的勾勒。

第一章 清代论辨文

清人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在论辨类中收入了“论”、“原”、“辨”、“解”、“说”等用于说理论道的文章,认为“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分类标准,比较符合古代论辨类散文的创作实际,历来为人所称道。清代论辨之文,秉承前代,“论”、“辨”、“考”、“原”等众体皆备。刘勰(466—539)说,“理形于言,叙理成论”(《文心雕龙·论说》),论辨之文的核心在于言理,而考原之文则需明经辨理,推究源流,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清代的论辨之文既有陈政辨史之文,亦有释经论文之著。而就其创作内容而言,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易代之际,经世致用之风兴起,史论文和政论文均表现出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一些作品思想深邃,对历史和传统政治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经过鼎革之变,一些文人的心理受到巨大冲击,文风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初期至中期,在文化高压政策下,考据学兴起,论辨之文形式上更加规整,内容上亦比较单一,训诂、辨伪等考据文章大量涌现,有较强的学术性而缺少深刻警醒的现实意义。至清季,伴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渐成为社会主导,这一时期的论说文创作,成为古典散文最后的高潮。

第一节 明清之际论辨文(一)

明清鼎革之变,给学者文人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冲击。江山易代、舆图换稿的时代变革,促使他们对前代历史进行反思,经世致用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学人们试图找出封建王朝没落的根本原因。他们抨击脱离实际的清谈学风,并以历代兴亡为借鉴,对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教设施、赋役财政等各个方面进行批判探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朱舜水等人是这一思潮的代表。这些思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末世的危机,但却带着较强的经世色彩,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文章的角度看,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论辨之文,是清初论辨类散文创作的代表。他们的论辨之文见解深刻,鞭辟入里,既是充满智慧的哲学著作,也是语言精辟的优秀散文。郭预衡先生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作出了精到的评述:“就学问而言,三人穷经治史,都讲经世致用,但其理学渊源,亦各有所宗。顾氏崇尚朱熹,王氏希踪横渠,黄氏则独重阳明。三人各有宗主,却不立门户。一代学风,甚为淳朴。”^①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别号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明末曾参加复社,受晚明实学思潮的影响,有经世之志。清兵南下,他从昆山令起兵抵抗。清兵入关后,其母绝食而亡,临终遗言,望其勿事二姓。这些经历对顾炎武的为人治学皆有深刻影响,也坚定了他入清之后不事二朝的坚定信念。《清史稿·儒林传》评价顾炎武一生治学“大抵主于致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县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在为文方面,他不作应酬文字,

^①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自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梁启超称其为清学之祖，实不为过^①。

顾炎武的《郡县论》和《生员论》是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政治论文。这两篇文章针对晚明积弊，从国家管理和取士制度两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

《郡县论》共九篇，论述涉及政权的组织结构、地方机构的设置等多个方面。在其一中他写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对分封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弊端皆有所指。就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来看，中央权力过大和地方权力过大皆有不足。郡县制是造成当今“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的原因，故急需变革。顾炎武以为，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应该说，这是一篇极具辩证思想和现实意义的好文章。顾炎武所构建的对国家政权组织的改革方案，反映了一代学人强国救世的理性追求。

较之《郡县论》，《生员论》则具有更多的感性色彩。生员之称，始自唐代。唐国学及州、县学都规定学生的员额，故称生员。明、清时，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亦称为“生员”。自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度，对于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至明代，这种取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文中云：“亭林之《日知录》，为有清一代学术所从出，尚矣。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虽未成之本，然后世言人文地理者祖焉，至今日其供学者参考之用者益广也。亭林深知生计与政治为切密之关系者也，故言之尤断断也。其生计学皆应用的也，彼小试之于垦辟而大效，惜不能尽其用也；不然，亭林一越之范蠡也。声音训诂，为百余年间汉学之中坚，其星宿海则自《音学五书》也；金石学自乾嘉以来，蔚为大国，则亦《金石文字记》为其先河也。故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

士方式的弊端日渐显露。考试内容的局限,使得读书人皓首穷经,缺乏治生和治世的实际能力。而生员所拥有的特权,使得一部分生员附着在政权周围,逐渐成为社会的毒瘤,顾炎武对此深有所感。《生员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写生员制度的弊端,指出生员本应“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当今生员数量巨大,却鲜有栋梁之才。作者用今昔对比的方法,分析当今生员制度的弊端,指出“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中篇语句激越:“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视生员为政事不清、百姓困穷、门户分立、治世无才的祸端。虽然语句偏颇,但也切中肯綮。下篇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构想。三篇论证严密,有着较强的逻辑联系。其中以中篇最著名,文中写道: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之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

作为一篇论辨文,文章逻辑严密、论证有序,而且语句生动,颇具文学色彩。自宋以来,科举入仕皆被认为是为官正途,生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官府政事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中一部分人,与官府结交,武断乡里,为害一方。顾炎武在文中,将“生员”与“乡宦”、“吏胥”并立,指出三者是“天下之病民者”,非但无益于民,反而加重百姓的负担。其描摹生员“挠官府之政”时近乎白描的手法,极其形象。“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作者对生员的嫌憎,跃然纸上。其实,生员的存在,有其一定的

历史原因，顾炎武对其的憎恶，也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去除“生员”，只是文人感性的愤激之语，并没有实际的操作可能。文章反映了顾炎武对知识阶层的反思，也是他对积重难返的明末弊政的批判。文章有其一定的理性价值，但打动人心之处却在于其感性的文学色彩。

顾炎武对晚明官风士风的衰微极为关切，其《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其中《廉耻》一文，对此亦有所批评。作者提出：“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士”的“行己有耻”关乎国运。此文也是为世传诵的名篇。他所忧心的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代学人理性之思，亦是他们的感性之痛。

在史论方面，顾炎武的《革除辨》是一篇能给人带来启示的佳作。文中云：

革除之说何自而起乎？

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改元矣。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

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夫建文无实录，因成祖之事不容阙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纪。使成祖果革建文为洪武，则于建文之元，当书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纪洪武，而但革建文，亦当如太祖实录之例书己卯矣，今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书于成祖之录者，犂然也。是以知其不革

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号于元年之上,而但一见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书,此史臣之失。(《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

文章所探讨的是有明一代影响深远的建文事件。这一事件,被许多学人认为是明代国运转换、世道升降的转折。顾炎武从历史记载入手,以为“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在对历史的辨析中,融入了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顾炎武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纠缠于“篡”改之名,而是以文献为依据,分析历史事实,文风质朴,而又不乏新见。

彭绍升(1740—1796)《亭林先生余集序》称:“亭林顾先生间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而生逢革命,无所发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为文,至于家国存亡之际,慷慨伤怀,天性激发,以视屈原、贾生,未知其孰先而孰后也。”(《亭林余集》)点明了顾炎武散文创作“慷慨伤怀”的一面。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学者,顾炎武的论辨之文,多立足于明末衰变的社会现实,有的放矢,不为空谈,不尚门户。他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既有政权的组织结构,也有世道民风。其出发点是救民图强,这一点是与晚明实学思潮相一致的。而从为文的角度看,这些文章大多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有些地方也带有文人式的愤激与不平,可读性较强,是易代之际论辨散文中的精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其父是明御史黄尊素(1584—1626),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下狱而死。明亡后,黄宗羲参与抗清斗争,失败后返回故里,专心著述。梁启超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并称他的言论在当时“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

之骤变,极有力焉”^①。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黄宗羲的一些论辨之文,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感染力。

明末清初,社会矛盾尖锐。明王朝的灭亡和满洲贵族统治的建立,促使一些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和激烈抨击,这其中以黄宗羲、唐甄最为著名。黄宗羲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为了总结明代政权溃败的历史教训,写了著名的政治学术论著《明夷待访录》,论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书成于康熙二年(1663),其中《原君》、《原臣》、《原法》诸文,是比较典型的论辨性散文。

《原君》一文探讨了处于封建社会权力顶层的君主问题,对君主的权力和指责提出质疑。文中写道:“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分析了古今天下之人对君主的不同态度,既是对历代文人学者批判君主特权的一个继承,也熔铸了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文章一气呵成,文脉贯通。他根据古代“天下为公”的思想和尧舜禹等禅让君位的历史传说,推论古代君位的设立和君主的职分,本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后世君主却把天下当作私人“莫大之产业”,传给子孙万代,于是给天下造成无穷祸害。因此他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些带有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极具挑战。故前引梁启超之语称赞本文为“极大胆之创论”,对“晚清思想之骤变”起了促进作用。当然,作者极力赞扬古之人君,把社会动乱和王朝兴替的原因归结为人的自私本性,也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局限。

在质疑君主制度的最高权威在“君”的同时,黄宗羲也在推究为臣之道,在《原臣》一文中他写道: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官妾之心也；君为已死而为已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明夷待访录》）

文章开篇即用两个设问句，否定了臣对君的绝对忠诚。其后指出“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才是“臣”的价值。为臣之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官妾之心也；君为已死而为已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这不仅是对明末政治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批判。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黄宗羲，说他的思想是“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并称自己的政治运动受其《明夷待访录》很大的影响^①。

《原法》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黄宗羲认为，法律的制定，应该立足于百姓的利益，而君权统治之下的一家之法，是无益于天下的“非法之法”。作者对比了三代以上之法和三代以下之法的不同，以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